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吴天明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核心价值观;历史分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1.01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主要“优秀”在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当然要弄明白。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兼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层面、行为方式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应指后者。“传统”的时代上限应为考古学上的“黄帝古城”时代,距今大约5500年;^[1]下限指清末民国,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五千多年一直基本分为两个阶级:治理国家的贵族官僚阶级和从事农工商的平民阶级,即孟子所谓“劳心者”“劳力者”。历代少量奴隶都不足以成为一个阶级,^[2]他们大都是异族战俘、本族罪犯及其后裔,因贫为奴者极少。周代文献称贵族官僚为君子,平民百姓为小人。孔子细分贵族官僚为两类,称治国富民者方为仁德君子,无意治国富民者也是小人。^[3]五千多年中,治国富民的君子文化才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身为贵族官僚实为自私小人的自私自利文化和平民百姓的农耕手工业商业文化都是支流,所谓“传统文化”即指仁德君子的思想文化,君子治国富民的终身追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价值观的“核心”所在。

作者简介:吴天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核心价值观的研判方法

中国古代治国富民理论即核心价值观具体是什么,我们可以采用很多办法描述和总结,正所谓“大道至简”,笔者想用两个非常简便的办法对此作出基本判断。

第一个办法,可以结合最近十几年中国学术界不断揭露西方伪史的情况,通过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简便总结一下。最近十几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清末民国以来被部分中国学者深信不疑、崇拜不已的西方历史文化,正在一步步暴露出其虚伪的面目。不过不管西方历史作伪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西学是否借鉴抄袭了东方学术,不管西学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所谓古希腊时代,还是仅仅起源于几百年前约当中国明代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文化的主要理论特质都是注重探究自然奥秘,以哲学和科学为主要特色,重在抽象思辨的就是哲学,重在实验实证的就是科学,哲学与科学实际上是一回事。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原本也非常注重探究万物的奥秘,也注重思辨和实证,而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据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在明朝以前的大约两千年里,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明朝开始突然明显落后于西方,而这一历史节点与郑和下西洋唤醒西方海盗正好吻合,至于是否可以证明西学作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就整体情况而言,注重探究自然奥秘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古代始终不能登上庙堂,不能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这很可能与中国先民的生存发展环境整体上比较优渥,物产比较丰富,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都相当不错,无需特别关注自然奥秘有关,也可能与探究者大多身份卑微有关。中国历代先王、王官、学者始终很少关注探究自然奥秘,而更加关注如何治国富民,如何按照社会公认的准则让治国君子适当获取私利,如何保证国家公道公平。也就是说,西方思想文化以探究自然奥秘的哲学和科学为主要特色,而中国思想文化则以富裕苍生、利人利己、公道公平的治国之学为主要特色。

第二个办法,我们还可以根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的发展轨迹,而不是像最近百年许多学科的学者那样,根据王朝兴替的轨迹,对中国五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史进行分期,以便一个个历史阶段地实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这就需要花点功夫了。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象都非常复杂,无数问题缠绕在一起,叫人发懵。想要理出头绪,发现关键问题和主要脉络,然后化繁为简,找到历史发展规律,殊非易事。最近百年,中国思想史和政教文史哲学等学科的学者,大多采取基本参照王朝兴替的分期法,一般将各自学科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几个历史时期。这样分期并非全无道理,主要缺点是不利于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理论体系和发展规律,容易让中国思想文化史显得支离破碎、脉络不清,其核心价值观和主要优秀之处更容易被大量史料淹没。而且将思想文化史与王朝兴替史高度绑定,假定只要王朝兴替,思想文化就一定会随之发生转折性的改变,也经常不符合历史事实。

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平,是中国历代君子一以贯之的主要道德学问和不懈追求,是中国古代无比复杂、无比光辉灿烂的全部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藪和灵魂,因此笔者主张根据国家治理理论产生与否,成熟与否,是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这个简单的标准,将中国古代五千多年漫长的思想文化史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时期,从大约距今5500年的“黄帝古城”时代开始,至春秋时代晚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全部定型传世为止,前后大约2700年。^[4]2. 九代后九代之交即春秋战国之交,孔子“新王之道”时期,从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开始设帐算起,经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孔子去世四十四年后曾子去世,随即

《论语》成书传世,标志着孔子“新王之道”创造完成,前后总共82年。^[5]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战国至今为后九代,主流意识形态去宗教化,鬼神退出治国舞台,国家治理实行世俗政治。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从孔子去世一直到汉初,前后大约200多年。4.汉至清代经学时期,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清末民国废除尊孔读经、科举取士,前后大约2000多年。5.清末民国全盘西化时期,大约50年。根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本身的历史轨迹来分期,可使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更鲜明,发展脉络更清晰,应比依据王朝兴替分期稍胜一筹。而且通过如此分期还可发现,除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短暂自我迷失,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以外,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均以孔子总结发展六经的仁学和礼学为基本理论,均以治国富民、利人利己、公道公平为核心价值观。^[6]下文略加说明。

二、“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观

关于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治国学问及其核心价值观,笔者将这一历史时期合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主要考虑有四:

其一,九代先王的治国实践记录,即春秋晚期战国文献所谓的“先王陈迹”,现代考古有新发现,传世史料亦有记载,可以互证。在距今大约5500年的“黄帝古城”时代,中国开始出现辉煌的城市,而城市才是阶级、私有制和国家文明真正形成的可靠标志,比距今9000—7800年的舞阳聚落文明更加可靠。有了大量的剩余财富就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有了国家就有个如何治理的问题,不然所有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最近百年中国几代考古学家均发现,“古国”治理均将神权、政权与军权融为一体,而均以神权为主,^[7]这就是当时的治国实践。以神权为主治理国家,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据《左传》记载,春秋晚期君子言及诸侯治国,均称“主祀”,不称“主政”,如鲁侯“主鲁祀”,齐侯“主齐祀”之类;天子诸侯卿大夫所立储君,均称“宗子”,取守宗庙朝廷^[8]之意。直到战国时代,宗教鬼神才最终永久退出了国家治理的舞台,中华文明于是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伟大文明。^[9]

传世文献对五帝时代早期如何治国也有所记载。春秋文献有“周乐”一说,指周代华夏列国普遍采用的九代先王治理国家、教化嗣君的古代诗乐,也称“古乐”“乐”,最早的就是黄帝时代的组诗组乐《大卷》《云门》,九代君子无不熟悉。可惜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国君子大都不喜欢宗教色彩太浓,只有教化作用,缺乏娱乐性的“古乐”,只喜欢娱乐性很强的世俗“新乐”“郑卫之音”,所以九代“古乐”大多亡佚。好在战国《周礼·大司乐》保存了“古乐”的题目和内容介绍。根据《大司乐》我们仍可判断,《大卷》《云门》就是黄帝时代的王官们教化贵族子嗣如何治国富民、适当获取私利的诗乐。^[10]此外孔子著有《五帝德》,司马迁著有《五帝本纪》,亦可与《大卷》《云门》互证。五帝晚期至春秋时代历代先王治国的“先王陈迹”,《虞书》《夏书》《商书》《周书》、鲁《春秋》均有记载。

中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历史传承的国家,不要说大名鼎鼎的二十四史,即使早在遥远的九代,口传史、成文史就有连续的记载。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九代部分史料失传,但只要我们结合考古用心研究,九代历史完全可以连续上。中国古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历史记录,最要紧的原因是,历代先王均特别重视对自己的子嗣进行如何治国富民,如何适当获利的教育,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古史是帝王家书,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史是历代帝王的治国教科书。

其二,“先王陈迹”所体现的九代先王治国之道,即春秋战国君子所谓“先王之道”,传世文献亦有迹可循。《论语》误收《尧曰篇》有孔子弟子摘录以备记诵的《虞书》片段,而孔门所读《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并称《书》,都由周天子史官最终定稿,各国史官分别抄录,相当可靠。其中有一片段记

录尧舜禅让时均叮嘱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四海苍生生活困穷，缺衣少食，那么老天给你的禄位就永远终结了。这说明，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芸芸苍生丰衣足食，如此则治国者亦可获取禄位，以满足其衣食之需。这就是五帝时代思想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

继尧舜总结五帝时代的治国理论之后，周公对五帝夏商先周时代的治国理论也作了理论总结。《左传·文公十八年》援引了战国时代失传的周公《周礼》的要点，总共十六个字：“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核心意思就是“功以食民”，即所有治国者都必须先为芸芸苍生建立富民之功，让平民百姓全都衣食富足，然后根据功劳大小决定治国者所得之食的多寡。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芸芸苍生全都衣食富足，这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治国理论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

其三，九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不人神混杂，天人交通，国家治理无不实行政教合一，与战国至今后九代人神揖别、天人两分的社会意识形态，世俗政治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

其四，九代是中国治国理论的草创期，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奠基时期。“先王陈迹”及其体现的“先王之道”均始于黄帝时代，上文已描述。距今大约 5800 年的二里头都邑文明，没有文献佐证。“先王陈迹”至春秋时代中晚期定型，标志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由周天子的王官们（包括史官、乐官、卜官等）定型传世。^[11]但六经中所包含的“先王之道”，虽有尧舜周公的理论论述，但他们的理论总结还不够全面深刻，“集大成”的全面总结工作要等待孔子来完成。

简而言之，九代“先王陈迹”所体现的“先王之道”，以君子必须治国富民，然后按照天下公认的准则，适当获取有限的私利为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

三、“新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观

春秋晚期战国时代君子均称记录九代先王治国实践的六经为“先王陈迹”，均称六经体现的九代先王治国富民之道为“先王之道”，而汉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则称孔子总结发展九代“先王之道”，进而创造的孔学为“新王之道”。

“新王之道”不是孔子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以孔子为主，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的合力创造，以孔子开始设帐授徒为起点，《论语》成书为终点，^[12]前后历时 82 年。《论语》成书才标志着孔学创造完成，此后发展的六经之学和孔学则不称孔学，只能称为儒学。孔子去世，即标志着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13]《论语》剔除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标志着政教合一九代的结束，人神揖别、政教两分后九代的开始。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即九代后九代之交，处在中国历史发生千年巨变的关键节点上，^[14]孔学之所以特别重要，即与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节点密切相关，也与孔子师徒祖孙继尧舜周公之后，系统研究“先王陈迹”六经，系统总结并发展“先王陈迹”所体现的“先王之道”密切相关。

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六经文本，由周天子的王官定型于春秋时代中晚期，^[15]定型不久，中国历史很快就进入了天翻地覆的战国时代，“先王之道”对汉至清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孔门创造的“新王之道”来实现的。这主要是因为：其一，春秋时代，铁制工具已经比较普及，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海量的社会财富，天下君子很少不会因此不动心，为了私利丧失理性，因此弑父弑君者比比皆是。其二，春秋霸主，如郑武公、郑庄公、齐桓公之类，起初还能够假模假样地“奉天子以令诸侯”，至晋文公称霸，“以臣召君”，此后春秋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遂为常态。其三，从春秋时代中期开始，列国均开始了土地兼并，世族豪强侵占中小贵族和平民百姓土地成

为常态,以致鲁国不得不率先修改法律,实行“初税亩”,即按照卿大夫实际拥有的土地征税,这等于公开承认夏商周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被正式废除,公开承认土地兼并和私有化合法,《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经济格局完全被打乱。其四,列国世族豪强实际控制诸侯,亦逐步成为常态。这就意味着,刚刚定型为文本的“先王之道”,实际上已经被天下君子所废弃。孔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无论是从治国实践上讲,还是从治国理论上讲,孔子都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需要对九代“先王之道”进行系统而深刻的理论总结,因为此前尧、舜、周公的理论总结,整体上还比较粗疏。二是需要根据春秋时代出现的上述新情况,科学地预测未来历史的走向,发展“先王之道”,使之能够治理当下和未来的中国。

在孔子之前,春秋君子已对九代“先王之道”有所继承和发展。例如春秋初期卫国君子石碚主张治国者要“六顺”,反对“六逆”;齐国君子管子主张齐国应担任华夏领袖,组织华夏列国抗击蛮夷戎狄,保卫华夏;齐国晏子反对宗教治国;^[16]楚国子西只想楚国独大,对天下如何完全不在意;^[17]郑国子产虽然恢复了夏商周的井田制,公道公平公正地重新划分了田界,收回并重新分配了世族豪强兼并的土地,但其视野也仅仅局限在郑国。^[18]这些思想家理论家实干家更多只注意完善本国当时的治国实践,其治国理论尚缺乏真正的天下视野、未来眼光和理论高度、历史深度。而孔子不仅是治国实干家,他当过三年多的鲁国公卿,也是治国理论家,他办了将近四十年的民办公助的国学,为列国培养治国君子,他的视野,空间上考虑的是整个天下,而不只是某个方国。^[19]时间上,他很注意总结九代先王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思考治国理论时,为子孙万代长远谋划,而不仅仅考虑鲁国,考虑当代,所以其治国理论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孟子称赞孔子“集大成”,董仲舒称赞孔子“立新王之道”,即与九代“先王之道”相对而言,孔子创立了一种新的王道即新的治国之道,这些都不是溢美之词,汉唐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孔子所论的确是古代国家治理的真理。

孔子认为,尧舜治理国家时,都毫不染指天下的利益,其治国之道至大至公,至善至美,但尧舜那个“天下为公”^[20]的原始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经济大发展,剩余财富大增,已经“天下为家,人人为己”,再要求君子治理国家时完全不取得任何私利,不考虑君子自己也有衣食之需,已经完全不再可能,所以尧舜治国之道不宜提倡。

孔子认为,人性天生自私自利,这是无法改变的;生产力水平会逐步提高,经济会逐步发展,剩余财富会逐步增多,也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天下为公”的原始时代,所有成员都大公无私,不取私利,那是因为无利可图。在“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的时代,只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共同富裕、公道公平的治国之道,才是万世不变的国家治理之道。在这个时代,君子在认真为平民百姓谋取公利的同时,也需要适当获取私利,以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不过获利的方式和尺度都要完全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君子公道治国富民,终身为芸芸苍生谋取公利,孔子谓之“仁”(德);公平获利,为君子自己和子孙后代谋取私利,其获利方式和尺度均完全符合天下公认的礼义准则,孔子谓之“礼”。孔子所谓“仁学”“礼学”的要点其实就是这样简单。^[21]

孔子认为,春秋君子治理国家,虽然大多实际上也实行了仁政,客观上对芸芸苍生也有利,但春秋君子们都是迫不得已而实行之,春秋君子的治国之道,本质上都极其自私、愚蠢、虚伪,所以也不能提倡。

这就是孔子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与九代“先王之道”相比,孔子的“新王之道”主要“新”在:其一,关于治国君子如何获取私利,从尧舜周公相关论述来看,九代主张“论功行赏”,即“功以食民”,孔子主张“按位取酬”,即“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这是孔子在礼学上的重大创新。这一主张虽有固化阶级阶层的明显缺陷，但有利于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政治稳定的大局，所以汉代以后一直被实行。其二，关于君子治国，九代理论家没有考虑到现实政治实践中，部分君子实际上的确无法实现治国理想的客观情况，孔子关注到这种情况，并且创造了“恕道”，也就是当自己实在无法实现治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人生理想时，君子可以宽恕自己，他人无法实现理想时，也应该宽恕他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本意，没有后世哲学家说的那么玄乎。这是孔子在仁学上的贡献。这两个创新，就是孔子“新王之道”“新”的地方。

最近百年学者常说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等，给他很多头衔，并非全无道理，不过都不是孔子的本色当行，不能体现孔学的本质属性。若论本色当行，孔子首先是私立公助国学的一位教师和治国专家，负责为华夏列国培养治国人才，他的学生，除了颜回、闵子骞、原宪坚决不肯做官以外，其余全都做了治国官员。孔学首先是治国富民、利人利己之学，然后才是其他什么学如哲学之类。中国后世政教文史哲法的许多学问，都是治国之学的分化衍生之物，都以治国之学为理论渊藪和指导思想，直到如今仍然如此。^[22]好比中国任何一个厨师都知道需要“五味调和”，而“五味调和”的确是哲学思想，我们却不可以把中国厨师都认定为哲学家，把他们制作的菜肴都视作哲学著作。要论本色当行，他们都是厨师，其作品都是菜肴。同样的道理，要论本色当行，孔子只是治国专家，《论语》只是治国之书，至于其他头衔和名目，都是清末民国中国学术全盘西化以后按照西学套路虚头巴脑的后话。

四、战国子学的核心价值观

孔子去世即表示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来临。孔子弟子皆无比崇拜孔子，但他们也都明白，在那个海量剩余财富已严重影响了治国君子的正常心智和行为，君子为了一己私利已经不顾一切的疯狂时代，九代“先王之道”也罢，孔子“新王之道”也罢，几乎都已经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只有曾子一派继承了孔子的衣钵，传授孔子“新王之道”，^[23]其余弟子都探寻治国富民新路去了。孔子早期弟子只做官不设帐，^[24]晚期弟子则全都既做官又设帐，探寻新路，加上当时还有另外一些读书人也在寻找治国新法，于是造成了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争鸣结果就是如今传世的战国诸子。

最近百年的中国学者，受到西学分科的影响，纷纷把战国诸子分别纳入自己努力的那个学科，^[25]也就是说学者只见诸子之异，不见诸子之同，这正是学问分科太细的短处。其实诸子之学原本都是治国之学，都只是九代“先王之道”、孔子“新王之道”的发展、分化、细化、衍化之物而已。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早已指出，战国诸子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治国之学。^[26]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卓越见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汉代创造了目录学，汉代至今，中国目录学一直将治国经典列为最重要的第一等书，故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包括《论语》在内的新六经列为第一等治国之经书，将诸子之书列为第二等治国参考书，此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之经部（六艺部）也都如此分类，^[27]说明后世官方一直认为，六经之类古书都是先王的治国经典，诸子之类新书都是治国参考书，可见古人一直认为，子学就是对六经之学、孔子之学的发展、分化、细化、衍化，本质上都是治国之学，都体现了中国君子文化治国富民的核心价值观。

五、汉至清代经学^[28]的核心价值观

战国子学从孔子去世开始，实际上延续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由于董仲舒发现孔子“新王之道”比九代“先王之道”和战国子学都更适合治理国家，故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此后汉唐学者大多认真研究先秦治国经典，主要是研究六经、孔学、子学，以吸取先人治国实践的经验教训和治国理论的精华。汉唐治国者也大多主要按照尧舜周公孔子的治国理论实际治理国家，所以创造了“汉唐盛世”。

汉代学术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家最推崇孔子，古文经学家则既推崇孔子，更推崇周公，他们认为孔子只是周公的继承者而已。郑玄注释先秦经典，充分吸收了两派的优点，两派纷争遂调和。魏晋南北朝学者喜欢《易经》《老子》《庄子》，并称“三玄”，后来佛教流行了，又喜欢谈佛理。这个时期人们不重视儒学，不过易学本是九代“先王之道”和孔子“新王之道”的重要经典之一。至于《老子》《庄子》，按照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的观点，本质上仍然是治国之学，所以玄学家事实上还是对古代治国思想有所继承。当时“三礼”似乎是个例外，尤其是《礼记》中的《丧服礼》，受到当时君子的格外重视，因为这个时期国家采用九品中正之法选拔官员，首先要看君子的门第出身，那么嫡出庶出问题就很重要了，而分别嫡庶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丧服制度，所以人们都爱讨论这门学问。

唐代继续推行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还请孔颖达等大学问家整理“五经”，作为天下学子学习考试、现任官员实际治国、卸任官员评价治国的规范。汉代至今一直误认为《乐经》失传了，故九代六经在汉代至今成了五经。唐代官方整理“五经”的负责学者就是孔颖达，孔颖达组织了一批学者来写“五经正义”，将前代的研究成绩作了一次总结，同时也向世人提供了经传解释的官方定本。“三礼”中，孔颖达作《礼记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本来春秋称六艺，战国称六经，汉代至今称五经（无《乐经》），唐人觉得经传并行，不可分离，有些“传”的地位其实并不比“经”的地位低，于是他们就确定了“九经”作官学，《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穀梁传》以及“三礼”中的《周礼》《仪礼》全都升格为九经。晚唐增列《论语》《尔雅》《孝经》变为十二经，南宋增列《孟子》最终成为“十三经”。

汉唐学者主要是对先秦经典作章句注疏，以小学为主，在义理之学即大学上并无什么创造。宋代学者觉得，小学没多大意思，他们更喜欢发表宏大的议论，于是形成所谓“理学”“新儒学”。宋人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学家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来加以阐释，前者指出修身的路径，后者辨明修身的境界，然后再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元明清三代的士子们便长期研读“四书”。

明代学者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继承了南宋陆九渊一派，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即所谓“心学”。明朝灭亡后，明末清初学者反思明亡的教训，觉得宋明“理学”“心学”形成空谈风气，罪责难逃。故清初顾炎武等学者主张“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自顾炎武、黄宗羲后，那种恢复汉唐质朴治学的风气渐渐浓了起来，于是形成“朴学”（亦称汉学）。到乾嘉时代，朴学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

世界上所有学问的发展都会遵从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大道至简”，此后越发展越复杂。汉至清代学问的发展路径也是如此，那些学问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整体上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始终围绕着治国富民这个主题，研究先秦文献，解读先秦经典。其二，始终重点围绕着九代“先王之道”、孔子“新王之道”，作出各种各样的解读，引申出许许多多的观点，所以汉至清代为经学时代。经学时代2000多年的学问，除了将先秦学问进一步抽象化、哲学化，或者就先秦学问的某一点不断深挖、细化以外，其初衷和主旨，仍然只是为了经世致用，故仍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治国富民的核心价值观。

六、清末民国的全盘西化

大汉以后，中国大多数时代都以尧舜周公孔子的治国之道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整个思想文化的内核，^[29]汉朝以后，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强国，就与孔子的治国之道有比较密切

的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何核定治国君子的私利多少,是所有帝王国君都无比头痛的问题。孔子不主张按照“先王之道”实行“论功行赏”,而主张根据君子不同的政治地位“按位取酬”,汉至清代便长期实行孔子的办法,这对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意义非同小可。“按位取酬”带来社会流动性降低的缺陷,则通过办国学培养平民化的士、举孝廉、九品官人法、科举考试来缓解。

清朝中晚期,国家治理者极其愚蠢自私,终于彻底失去民心,于是国家衰败,外敌入侵,中国几乎灭种灭族,故“五四运动”先驱愤怒地否定中国所有传统思想文化,并要“打倒孔家店”“废除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完全废除汉字。这种过激的思潮和做法在当时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对打倒封建,建立共和也不无积极意义,但也产生了中国学术全盘西化,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以致整个社会行为长期失范的严重副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民国的全盘西化,事实上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即使激进主张全盘西化的那些人,其灵魂深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逐步矫正了清末民国的错误思潮,如今国家更明确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传承并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史,其基本思想始终都是,所有治国君子都要终身治国富民,但君子获取的私利非常有限,而且获取私利的方式和尺度都要遵从公认的准则,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价值观的“核心”所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弥足可贵。

注释:

[1]黄帝古城时代是“古国时代”(距今5500—4500年)的早期阶段,且有传世文献佐证。根据国家文物局2023年12月9日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研究成果,“古国时代”始于距今约5800年的二里头都邑。笔者目前还没有读到第五阶段的考古报告,故仍然采用前四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以距今5500年的黄帝古城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起点。

[2]亚洲欧洲凡是实行奴隶制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气候恶劣,物产稀少,生存艰难,不残酷奴役他人就难以生存,而绝大部分地区进入阶级社会后,都没有真正实行奴隶制。195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照搬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说夏商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时代。其实中国那时实行井田制,耕者有其田,天下没有奴隶会有让自己足以活命甚至富裕的农田。

[3]无意治国富民者与小入一样,也只顾私利。详见吴天明:《“大德”“小德”辨》,《学术界》2022年第5期。

[4]根据国家文物局2023年12月9日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研究成果,“古国时代”提前至距今5800年,如此则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历史时期,大约为3000年。

[5]孔子开始设帐的时间,司马迁《孔子世家》误读《春秋》《左传》,故确定为鲁昭公七年,可参阅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中州学刊》2021年第5期。曾子卒年,可参阅杨伯峻:《论语译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孔子师徒祖孙合力创造孔学,耗时82年。

[6]据李学勤、杨朝明《国学·儒学·经学》(《孔子文化季刊》2010年第1期),李学勤先生认为“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不够准确。本文认为中国思想文化均源于九代“先王陈迹”即六经,但六经本身并没有总结出“先王之道”即治国富民的理论,尧舜周公先后做过理论总结,孔子才是“先王之道”的伟大总结者。

[7]详见张天恩:《中国早期文明路径与文明史观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九),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8]据《左传》记载,列国上卿之朝曰“家朝”,诸侯之朝曰“公朝”,天王之朝曰“王朝”。天王七庙(宗庙供奉七代祖宗牌位)、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多于此数要“毁庙”。

[9][14]详见吴天明:《中国世俗化的节点和标志——以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和孔学为研究样本》,《东岳论丛》2023年第1期。

[10]分别见于吴天明:《乐教论》,《中州学刊》2023年第5期;吴天明:《诗教论》,《江汉论坛》2023年第9期。

[11]详见吴天明:《“孔子成六经说”考辨》,《学术界》2022年第10期。

[12]《论语》具体成书时间,传世文献没有记载。笔者根据曾子去世时间,假定《论语》成书于曾子去世之年,当与历史真相相去不远。曾子去世时间,可参阅杨伯峻:《论语译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鲁《春秋》即终于孔子去世,此后《左传》有传无经,说明鲁国史官以孔子去世为春秋时代结束的标志。

[15]此乃概言之。列国《春秋》自然由列国史官自行记录,自主定型,传世鲁《春秋》即由鲁国史官记录定型。六经定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周天王许多代王官的努力。子夏、孟子、司马迁至今,学者均称孔子定六经,这没有道理,不符合事实。详见吴天明:《“孔子成六经说”考辨》,《学术界》2022年第10期。

[16]晏子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厚葬久丧的宗教礼仪专家,于事无补,因此反对齐景公重用孔子。尽管他对孔子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仍然可以说明,晏子对宗教治国不以为然。详见《史记·孔子世家》。

[17]楚国令尹(执政上卿,类似后世之总理大臣)子西,倒并不认为孔子只是宗教专家,但是他误认为孔子的终极目的是恢复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其实孔子只是想统一天下,安定苍生,并非一定要恢复周家天下。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批评孔子想“恢复西周奴隶制”,这类说法尤其荒唐。姑且不论西周是否为奴隶制,孔子早就知道周天子已经失去了所有合法性。孔子去世后,弟子子贡甚至认为,要是老师孔子的运气好一点,他会自己来做天下人的王。详见《论语·子张》19·25。子贡的见解说明孔子并不一定要恢复周天子的政治地位。

[18]子产在郑国恢复夏商周井田制,虽然也是大功一件,却没有平定天下的政治企图和理论建树。这不仅与他的官职有关,也与他的政治视野、理论水平均受到限制有关。

[19]即使晚至春秋时代,周王国和几乎所有的方国,首都城外就有许多蛮夷戎狄的村庄,登上城楼即可看见。而且蛮夷戎狄在血缘、文化、经济、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都与华夏多有复杂深刻的联系。所以孔子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明融合蛮夷戎狄,要求华夏君子“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比管子联合华夏抗击蛮夷戎狄的政治安排又聪明许多,视野开阔许多。

[20]根据最近百年的考古资料,包括尧舜时代在内的古国五帝时代已经不再是“天下为公”的时代了。孔子以及后世历史学家长期认为尧舜时代“天下为公”,但并不准确。

[21]详见吴天明:《孔子的道德学问不只是一条主线》,《求索》2017年第4期。

[22]“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政教文史哲学等很多学科的理论渊藪和指导思想。最早把这个问题说透的是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3]颜回子路均死于孔子之前,无法继承老师衣钵。古人说孔子死后儒学分为八派,其实大多没有继承孔子的衣钵,这是由战国时代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死后,子夏独传四经,但那是传授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即小学,与曾子、子思、孟子一派人传授孔子治国富民之道即大学并不相同。

[24]这个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应该是,孔子的学问老了才老到。至今我们还常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孔子就是一个证据。传世《论语》中孔子年轻时的语录很少,例如他在齐国做官讲学八年时间,《论语》中大约只有几章,大多是他年老时的语录,这也是一个可靠证据。

[25]这样强行“拉郎配”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例如已经有学者对过去强行把《孟子》划入哲学非常不满,觉得这简直是胡闹。不能因为某人有哲学思想,就说他是哲学家,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26]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原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只举六家为例,并非表示春秋战国秦汉诸子只有六家,并非表示六家之外就不是治国之学。

[27]如今中国所有的图书馆,无论采用武汉大学图书馆分类法,还是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都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等的治国之书,其图书分类思路与汉代以来的做法完全一致:治国经典才是第一类书,才是经书。

[28]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学来自对六经的总结,故孔学亦可称为经学(李学勤、杨朝明:《国学·儒学·经学》,《孔子文化季刊》2010年第1期)。本可从。但本文考虑到两点:一是孔学虽然来自对六经的总结,但其“新王之道”之“新”处亦具有相当的原创性;二是如将孔学纳入经学,则整个后九代均为经学时期,线条未免太粗。故本文不称孔学为经学。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称先秦为子学阶段,此后为经学阶段,本文亦不取。

[29]详见夏春涛:《一脉相承 世所罕见——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版》2023年1月9日。

〔责任编辑:李本红〕